

【訪問文學家宋澤萊老師】

受訪者：宋澤萊老師

採訪&撰稿：賴胤擘（歷史系碩士班二年級）

【編按】

宋澤萊老師本名廖偉竣，為本系傑出系友。1952年出生於雲林縣，1976年自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系畢業後，一直任教於彰化縣福興國中至2007年退休。現今就讀於國立成功大學台文所博士班，宋老師身兼小說家、詩人、文學評論家、雜誌編輯數個身分，現任彰師大台灣文學研究所短期授課作家。

1978年宋老師以「打牛浦村系列小說」轟動文壇，兩年間又出版呼應寫實主義、浪漫主義、自然主義風格的五本小說；1980年一度轉向參禪。2011年所出版的《台灣文學三百年》為其最新論著，此書並獲巫永福文學評論獎。2013年，宋老師更獲得國家文藝獎。但除了作家與教師身分，宋澤萊老師同時也是台灣本土意識及新文化運動的重要旗手和理論奠基者，曾結合同志創辦《台灣新文化》、《台灣新文學》、《台灣e文藝》等雜誌。曾獲吳濁流小說及新詩首獎、時報文學獎推薦獎、聯合報文學獎佳作獎、吳三連文學獎、東元科技人文獎、國家文藝獎等等。

做為一個傑出的文學家，宋澤萊老師是如何選擇自己的人生道路並秉持什麼信念呢？《臺師大歷史電子報》透過這次面對面的訪談，以宋老師的創作經歷為廣大的讀者們揭開神秘面紗。

問：只要是對台灣文學有興趣的朋友，都曾受到宋老師作品的影響或啟發。老師在大學時所就讀師範大學歷史系，想請問您為甚麼當年會選擇歷史系？

答：其實當年我的第一志願不是歷史系，而是教育系。因為差幾分，我沒有考入教育系，就到第二志願的歷史系來。我對文學有潛力，這件事我高中時就知道，因為我的國文分數一向就非常高，聯考時考入師大的國文分數也是出奇地高。不過，我畢竟沒有選擇比較低分的國文系，考察其原因是由於我當時覺得歷史比國文有趣，因為我喜歡故事性的東西，它能喚起我的天馬行空的想像力，讓我的精神從有限的空間和時間解放出來，一變而接近無限，而不只是詞藻或文字之美那類的東西，所以我選擇了歷史系。後來念了歷史系，我才知道我或許誤解了歷史系，因為正統的歷史系治史方法不是依賴想像力和創造力。它強調史料的重要性，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事實上不見得那麼有趣。

問：老師在大學時代創作的作品，例如〈黃巢殺人三百萬〉，是不是多少受到當

時念歷史系的影響？

〈黃巢殺人八百萬〉是歷史新編小說，大半的素材當然來自歷史書籍，尤其是來自呂思勉那本隋唐史。但是此後我並沒有在歷史新編小說上下過更多的功夫。我不太願意把歷史素材改編成小說，總覺得文學家不應該竊取歷史家辛苦所獲得的史料，覺得那樣做有點不夠光明正大。

歷史的廣博知識對我後來的文學寫作的幫助才是重大的。你想想好了，我念過司馬光的資治通鑑那麼大套的書，對於一、兩千年的中國古代的政治社會還有多少不能瞭解的？我念過更龐大的威爾杜蘭的文明史，我對世界的文明文化還缺乏甚麼認識嗎？由於知道那麼多的歷史知識，我就能對現今人類的社會行為做一些未卜先知的預測。讀歷史的人都知道，念歷史的目的在於「鑑往知來」。所以說念歷史系給了我甚麼？簡單一句：它給了我對當今世界和台灣不少方面的鑒往知來的能力。這個預測能力我後來一直貫徹在我的文學創作中〔請閱讀我的長篇小說《廢墟台灣》就能了解我的意思〕，是我文學創作中所具有的最重要的特色。

問：從宋老師簡歷當中可以知道，您大學畢業後除了教學與創作之外，也一直在持續學習，在您求學的歷程中有沒有一些特別深刻的回憶或經驗？還有在這個過程中有沒有碰到一些挑戰？如果有，是如何去克服的呢？

答：這個問題可以從幾個方面來談：

我們的一生都在學習，不是學習這個，就是學習那個，很少人能不學東西而活在這個世界上。只是所學的內容有好壞、對錯、深淺的差別罷了。

畢業後，就我的教學專業知識這一面來看，好像學習得比在校時更認真。因為想要把書教好，使學生獲得更多益處，我很認真備課，不斷閱讀新的歷史著作，買來的歷史書籍難以計算，足足超過學校時代書籍數量的幾10幾倍以上，這當然也是因為能自己賺錢、有錢買書的原因。

另一方面是在社會的知識上。教書這件事其實不如一般人想像的那麼清高或不食人間煙火。由於校園隔了一道圍牆就是社會，你不可能對社會置之不理。由於常常接觸社會的人，知道社會的許多事情，想要把社會做一個清楚的認識，當時我繼續研讀大學時代沒有讀完的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努力要把社會的真面目看通。我畢業不久的那個70年代，也是社會政治變動得非常厲害的時代，台灣退出聯合國、石油危機、鄉土文學運動、美麗島事件……都告訴了年輕人要更注意社會和政治。我是實際參加若干政治、社會運動的人，和這方面的人士來往密切。因此，我不只是在書本中學習，也在日常生活中參與，對於社會逐漸體會深刻。我尤其注意農村生活的實際問題，對於農民所受到的剝削耿耿於懷。我其實

知道怎麼解決農村問題，只是我們的官方沒有誠意解決問題而已。

另一方面是我的宗教實踐問題，對宗教有追求的人其實是反映該人對自己生而為人的不滿意，有時這種不滿意還蠻巨大的。我由大乘佛教開始探索，後來探索到根本佛教〔小乘佛教〕，最後來到基督教。每個階段我都付出了一些代價。我學習宗教不是閉門造車，我直接找有名的人士學習。比如佛教方面我去找聖嚴法師參禪，在他的禪堂接受嚴格的訓練，我變成他最早期的弟子之一。我參破了一些公案，有了開悟見性的經驗，也瞭解聖嚴法師禪法的奧秘。到現在，我還在學習基督教，希望對基督教有更深的經驗。

最後當然是文學的寫作，這是最重要的，也是催促我不停學習的最重要的原因。為了要寫小說或是寫文學史，而又要顧信用，我不可能馬馬虎虎就下筆。我對我的作品的內容一定要事先進行研究，也因此，我不能不加緊我的學習。比如說最近我出版了一本《天上卷軸〔上卷〕》，它是一本基督教的小說，牽涉深奧的基督教教哲學問題，因此，我只好去中台神學院研究所旁聽一個學期的課。如今為了把《台灣文學三百年〔續集〕》寫好，我現在只好去念成功大學台文研究所的博士班。

總之，我的學習是不停的，而且都有大動作。我也不認為現在我已經學夠了，我還有待學習！

問：老師就讀師大時是屬於公費生時期，一般畢業生都是從事歷史教學工作，老師畢業後是回到彰化福興國中任教，並繼續從事文學創作。其中您的作品「打牛湍村系列」鄉土小說更成為 70 年代鄉土文學論戰的代表性創作。可以請老師向我們分享當年從事教職的工作經驗，對您寫實主義時期的創作有何種影響？又是甚麼動力促使您將臺灣農村社會展現在大眾面前呢？

答：在上面我提過做為一個老師，事實上不可能距離社會多遠，因為牆外就是社會，我們的課堂裡的學生都是來自社會各階層的家庭，你要把教育辦好，特別是你如果當了學校的主任或校長，你就必須加強認識這個社會，最重要的你對這個社會要有愛心〔也就是你對孩子們的愛心的擴大〕。我寫〈打牛湍村〉，是我對社會關懷的一部分，當時我只有 25 歲，不比你們大多少，剛開始接觸社會，對弱勢者非常同情，而農民在當時是最弱視的一個階層〔比工人更弱勢〕，我當然就為他們而寫作，這也是身為一個老師的人的愛心表現。

另一方面，我是農村子弟，我在農村生活了 20 年以上，對農村非常熟悉，寫作農民讓我駕輕就熟，所以我就寫農村，這是非常自然的一件事。

問：當年您的創作代表農民發聲，在70年代時是否也受到當局的壓迫？

答：其實是有的，我的《打牛湳村》就是一本軍中的禁書。在鄉土文學論戰期間，陳映真也曾被逮捕，只是馬上被釋放而已。幸好當時的國民黨文藝觀點分裂為兩派，當中有一派認為鄉土文學是強調對鄉土的愛，因此替百姓發聲沒有甚麼不對，導致後來國民黨的文工立場開始妥協，強調這批作家在「鄉土」的框架中運作還是OK的。只要不和共產黨或台獨掛鉤就行，替窮苦人發聲也行。這樣的模式被認同之後，鄉土文學就變成合法化，不再有被官方取締或禁止的危險，也促使更多人參與加入，鄉土文學的勢力一時之間就壯大起來。

問：老師的作品有一些是台語文學。我們可以從許多臺灣作家的努力中瞭解台語文學的重要性，但是在現代社會中的使用台語溝通依然存在城鄉差距，學生們也不見得瞭解母語的重要性與美麗之處，請問您建議未來須從事教職的師大學弟妹可以用何種方法將母語教學落實在歷史教學中？

答：要把母語教學落實到歷史教學中非常簡單，就是你可以在上課時常常用母語來教學。我記得我以前上一節課時，大概有四分之一的時間是用台語上課。學生的反應很好，因為他們聽到他們熟悉的父母的語言，會感到特別地親切。

上歷史課通通使用北京語是很傻的，沒有人叫你一定要這麼做，你可以用母語當輔助，包括客家語或原住民語言。假如說你上台灣史，那更應該多多使用母語，因為鄉土之情會隨著母語而散發出來，使你的台灣史更生動。

問：您曾經提過：「作品的意義比暢銷重要」。但現在社會中不論是文學作品或是史學著作現在都面臨年輕人對閱讀的興趣逐步減弱的問題。請問老師，當讀者減少，或是不能理解自己的作品時，您會如何處理「暢銷」與作品「意義」的關係？

答：「純文學」「純歷史」作品本來就相當難以被廣大的讀者閱讀；不單是現在，以前在書市上的反應可能更加冷淡。不過，有教育的管道可以傳播它們，不必擔心它們會被淘汰，反而應該提昇「純文學」「純歷史」作品的品質。妳也提到大家現在看的都是流行的東西，比如愛情小說、武俠小說、加油添醋的歷史傳記……等等；但認真思考後我們會發現，那些流行文化通常被當作消遣物的一部分，你找不到更深刻的意義，也沒辦法被深入研究、討論、思想，除了殺時間以外，它們就沒有甚麼用處。所以我認為「純文學」「純歷史」還是有它不可被取代的價值，它們具有的「意義」就能叫它們屹立不搖，能暢銷當然很好，不能暢銷又何妨。

問：老師的創作中以獨特的歷史視角，從人物形象來象徵臺灣在近代歷史上所遭受到的命運。早期關於黑暗心靈的作品更隨著環境、思潮改變再次開創小說創作的新局面，相當值得讀者欽佩！在訪談的最後，想請老師以您進行文學創作的經驗，給予師大歷史系以及學弟妹一些建議和期許。

答：70年代，我還在師大念書時，我們的歷史課以中國近代史為中心，除了王啟宗教授以外，很少人教授台灣史。中國近代史其實是非常蒼白悲哀的，念多了很不健康；同時也覺得那些事情很遙遠，與台灣人的自己毫無關係。在師大念了四年的歷史，坦白地說非常虛無，找不到一個支撐點。我的意思是說，念歷史可能變成一個吃掉年輕人生命活力的陷阱！

畢業後，我在文學上拚命書寫台灣的故事，其用意無非是要填補由於念歷史所帶來的心裡的那片虛無。後來自己花了很大的心力探求台灣史，慢慢看到王育德先生所寫的《苦悶的台灣》和史明的《台灣四百年史》，覺得非常驚奇，終於瞭解到台灣的歷史是甚麼，也找到了一個支撐點。

今天，台灣史的研究越來越豐富，各方面著作也越來越生動有趣，連我都動了心，寫了一本《台灣文學三百年》，算是一本文學史的著作，和我的讀者交換台灣史的若干見解。我希望更多師大的學弟妹能加入書寫台灣史的行列，它能使我們避免陷入虛無之中，覺得我們實際上活在我們所熱愛的鄉土之中。

「不要忘記你腳下的土地和歷史！」，這一句話可說是我對師大歷史系學弟妹們最深的期盼！

【後記】廖老師榮獲本年度國家文藝獎，本系深感與有榮焉。承蒙他的允諾，使得本次專訪得以順利完成，本刊特表感謝之意。本次訪談中，廖老師最後語重心長地勉勵現在還在就讀本系的學弟妹對土地的感情，確實值得大家深思。至於廖老師提到在過去的那個時空背景下，學習近代中國歷史多少有些悲涼或不踏實的感覺，畢竟都已成為過去。相信許多情況已經隨著目前台灣的整體時空環境而有所改變。無論如何，本刊仍衷心感謝廖老師接受專訪，分享他創作的心路歷程。